

「 思想散论 」

思想前沿与 文化后方

万俊人

“

公共哲学的空间
世纪末的中国伦理情结
北大：中国20世纪的文化精神侧面
爱默逊楼里的哲学和哲学家
思想的「距离」
进退之间——读罗尔斯及其《政治自由主义》
关于「可译」与「不可译」

”

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

東方出版社

万俊人

思想散论

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

东方出版社

33R86/01

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

责任编辑:陈亚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顾杰珍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万俊人.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0

(思想散论)

ISBN 7-5060-1595-1

I. 思… II. 万…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8595 号

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

SIXIANG QIANYAN YU WENHUA HOUFANG

万 俊 人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179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SBN 7-5060-1595-1/B·235 定价:16.00 元

自序

思前想后或许是所有思想者的正常心态。思想的行为是当前的,但思想的内容却可能是过去的,也可能是将来的,或者至少可能与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关联,是否与将要发生的事有牵连?则取决于思想的逻辑是否具有某种未来想象的真实。罗丹的“思想者”处于永恒的思想状态,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因为他似乎没有任何思想时间向度的暗示。罗丹的“思想者”自由而孤独,沉重而悠然。我猜想,“思想者”的自由和悠然来自思想者的思想世界与思想者的生活世界之间的距离,以及这一距离给予思想者及其思想提供的巨大空间;而“思想者”的孤独与沉重则源于其思想的不可替代性和无法排遣的问题感。人及其生活世界的问题是永恒的思想之源。

几年前,在为上海一家电视台举行的大学生电视辩论赛所作的现场点评中,我特意提示辩论双方的年轻选手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思想的专家,只有自由的思想者,这是思想与知识的根本区别所在。赛后,有选手质疑我的这一说法,问:“若果真如此,不是没有了思想家么?”我的答复是:“思想家”不过是“思想者”不太严格的别名而已,真正的思想者不可能成为某一种特殊类型的专家。现在想来,这一说法或许有些偏颇。思想与知识的确有某些不尽相同的特性,比如说,知识具有普遍的文化公共性,知识的基本原理普天之下,别无二致;但思想却

未必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思想总是有思想者个性的独特的观点表达。但另一方面,知识与思想却又息息相关。知识是人们思想、尤其有效思想的必要条件,知识的增长总有利于思想的生长,反之,知识的贫乏必然造成思想的贫困,这是没有疑问的。更何况知识是保证人们有效思想的文化基础。由此看来,在知识与思想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相互蕴涵的关系。正由于此,人们也可以把已有的思想成果看做是一种既定的文化或知识。事实上,某些类型的知识、尤其是文化性的知识,总是带有某种地方性或区域性的。这也正是现代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考虑和视角。

话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身边的一个例子。新近,享誉京城内外的万圣书园在我居住的住宅小区开设新店,内设一座咖啡厅,名叫“醒客”,取自英语中“Thinker”(思想者)的汉语读音。这命名同“万圣”(Allsages)的命名一样让我喜欢,不独雅致,而且韵味十足。俗话说:“人从书理乖。”只要肯读书,就能获得知识,懂得道理,更清醒也更理智地做人做事。如果进一步还乐意买书藏书当然更好(我想,至少万圣书园的经营者是这么认为的),继之,若在读书、买书、藏书之余,还能够静下心来,手把一杯咖啡,心系茫茫人世人事,若有所思,且思且想,就有可能从获取知识进至创造思想的妙境,久而久之,成圣成贤也非奢谈。万圣书园的经营理念真是妙极,让你满怀希冀地购书藏书,充满雅兴地品味咖啡、思想问题,仿佛顾客的购买只是一种纯粹的知识消费,甚至是一种价值无限的思想投资;他们将钱兑换成书的过程也仿佛不是由他们的个人财富变成书店老板的经济利润的市场交易过程,而是一种用钱购买知识,继而用知识创造思想的社会生产过程。如果人们认可知识即财富的理念,那么,这一过程

就完全可以被看做是用个人金钱换取公共知识财富或创造思想财富的过程。于是,顾客从作为市场买卖的交易者到作为社会公共知识和思想的创造者的角色转换,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

我相信,这一书市的经营之道是绝对值得赞赏的。不过,我利用这一例子想要说明的并不是万圣书园的经营之道,而是她的书市运作中所显露的一个更值得重视的关于知识与思想之关联的真理:知识和文化的积累是思想创造的前提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知识本身已然构成了思想素质的基本内容。话行到此,我又突然想到了时下人们对教育理念的讨论。有一种看法值得注意:它认为,现代教育的根本缺失是只重视知识教育,忽略素质教育。每每读到这样的论点,我就纳闷,是否知识教育就不是一种素质教育?难道知识本身不是一种人的素质?只有知识而无道德或审美情感的人当然不能算作是文明人,但只有道德或审美情感而无知识的人恐怕同样也不能算作是真正的文明人。

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知识、文化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上来。我仍然坚持认为,思想与知识或文化之间确有某些差别,思想总会或多或少地突破已有知识和文化的界限,思想的传统也不同于知识的谱系或文化的传统,而且思想者的角色与知识者或文化人的角色也不尽相同。但我不再坚持在思想与知识或文化之间截然划分出楚汉河界,相反,我越来越相信,在知识或文化与思想之间,永远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雨露之于小草的生长,或如空气之于生命的呼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在近年来逐渐对自己的为学之道作了些许自觉的改变。譬如,我不再拘泥于自己原来较为熟悉的哲学史或伦理学史一域,而是有意识地选读一些专业知识之外的东西,甚至去尝试阅读我周围

的社会和人事,努力解读和理解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同时也尝试去独立思考这些现象界的景象和变化,间或也尝试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下来,遇到合适的机会便把它们公布于众,以作为我参与公共讨论的提引。

我感谢一些报纸杂志的编辑朋友或主持人!是他们的盛情约请甚或催促,让我的这些并不成熟的想法能够及时与公众交流,并在这一交流的过程中得到他们和许多热心读者的指点、批评。通过与他们的沟通交往,不仅使我明白了许多新的道理,而且也促使我不断检审自己已有的想法,获得思想的进步。

我还想特别感谢我大学时代的老师袁伟时先生!是他的积极提命和催促,才使得这本小册子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编辑完成。自然,我还得感谢我的大学同窗余小华小姐!她也为本书的完成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努力。我尤其要感谢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的陈亚明主任!是她的善意理解和热情支持,才使得本书最终得以顺利出版。她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和友谊,是我应当永远珍惜和记忆的。

最后,我想交代一下本书的编辑内容。收录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大都是我近几年发表的一些学术随笔或专栏文章,它们虽然都是应约而作的,但基本上是我自己意愿写作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应命之作。还有几篇较长的书评也收集于此,但不包括我在《读书》、《中国图书商报》等报刊上发表的另一些书评。之所以没有把后一类的书评收集在一起,主要是因为我所写的书评有一部分较为学术化,而另一部分则较为随意一些。收录在本书中的书评大抵属于前一类。当然,这种区分也不尽然,只是相对而言。此外还有几篇访谈录也一并收集在此。访谈是一种较为自由的主题探讨形式,我之所以认可并采用这一形式,主要

是因为它比较节省时间,也比较随意,不像一些正规的学术会议讨论那样有过强的情景约束。不过,这样的访谈做多了也让我有所顾虑,惟恐引起学界的误解。因为时下人们往往容易赋予这种原本随意的交谈形式以过于严肃的权威形象。我既非专家,亦非权威,所以做起这类事来必须谨慎从事。

这些年来,随笔散文之类的形式越来越为知识学术界所看重,当然也有一些微词。我的感觉是,写作的形式并不是绝对固定的,学术和思想的表达的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黑格尔的哲学方式与萨特的文学方式都可以成为有效的思想表达方式,都具有学术表达的力量,都能找到自己的读者知音。既如此,我们就不必去强求一律了。更何况,在知识和思想的大众传播方面,这类较为随意的写作形式还有可能比纯学术的写作形式来得更为亲切,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认可。这当然只是我自己的看法,说说而已。

且为序。

万俊人

写于200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 南宁旅次

目 录

自 序	1
-----------	---

道德笔谈

公共哲学的空间	3
伦理学主题及其理论方式的当代演变	12
社会公平的代价与合理期待	20
世纪末的中国伦理情结	28
公正·秩序·责任：一个跨世纪的道德 话题	34

文化记忆

北大：中国 20 世纪的文化精神侧面	43
未名与无形	52
“五四”：“中国现代性”的世纪解读	58
科学理性：“五四”的现代性遗产	68
爱默逊楼里的哲学和哲学家	74

思想对话

走向现代伦理	89
估价·选择·创造	98
伦理秩序与伦理精神	104
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	109
社会动员与道德资源	121
洪水冲击下的“道德堤坝”	125

边缘人语

人文学者的角色	131
思想的“距离”	136
边缘心态	141
关于“文化健忘”	145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148
“后现代”的迷惑	152

文化的“雅”与“俗”	155
知识分子的文化根基	158

新书品评

价值学现代视境的点透与迷茫	163
“效率”与“公平”之间和之外	176
进退之间	193
“现代性谋划”的更新	207

序跋及其他

《比照与透析——中西伦理学现代视野》	
自序	215
“致中和”:文化对话与文化互镜	225
“私语”与“公语”	238
关于“可译”与“不可译”	245
《寻求普世伦理》后记	255

期待思想	263
------------	-----

道德笔谈

公共哲学的空间

—

如果人们仍然认定“哲学”乃“爱智”之谓的原始本义,那么“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的概念就应当首先限定在人类对公共生活智慧的追求范围内。形成公共的生活世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标志,其形成运作与人类语言的公共运用具有同等的人类文明意义。李普曼将公共哲学与人类社会文明联系起来考察的哲学立场是正确的。^①事实上,公共哲学本身的存在理由和可能性应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如何确定其理论限度、言说或表达方式,以及建立一种公共哲学解释的方法。

确定公共哲学的理论限度也就是确立其

① 李普曼:《公共哲学的复兴》,载于《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27—29 页。

基本主题和理论空间,亦即公共哲学可以说些什么。惟有先弄清它可以说些什么,才好进一步讨论如何说(表达方式)和怎样才能说得清晰完整、正当有理(理论论证)。把公共哲学说成是人们对社会生活或公共生活之智慧追求,隐含着一种工艺化和技术化的意图,即把公共哲学理解为给人提示某种在世生存技巧的学问或技术。这会产生非知识化的危险,而非知识化本身又隐含着公共理解的不可能性,这恰恰构成了对解释公共生活或社会生活之可能性本身的否定。所以公共哲学的第一困难是如何确立自己的言论主题和范围。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不能把公共哲学看做是囊括一切社会问题和社会层面或方面的解释系统,即使在相对于私人或个人哲学(这是标示公共哲学最起码界限的方式)的意义上也不能这样理解。公共哲学应有其特有的主题范围和层次。我个人较倾向于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等当代理性主义社会哲学家们的立场,这一立场将公共哲学的主题确定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及其运用的范围。不同的是,罗尔斯对公共理性有着较为严格的政治哲学限制,而哈贝马斯则更钟情于一种系统化的普遍理性主义社会哲学。于是,两者对公共哲学的理论层次便出现了不尽相同的定位。以严格的政治哲学维度来框视,所谓“公共理性”便是一组通过文化多元论前提下合乎理性的“重叠共识”所达成的基本政治原则。如宪政的合法性原则、政治中立性原则和社会基本政治结构的理念(如“自由”、“平等”和“正义”)等等。按照普遍理性主义的进路,所谓“公共理性”就必须通过更为复杂的社会观念和实践的批判来寻求,结果,多元文化和多种理性(“reasons”,理由)之间的对话以及形成这种对话所必需的语言、语境和言述之语用学与语义学条件,就不言而喻地成为了公共

哲学的基本课题。更重要的一点是,虽然这两种思路都力图摆脱传统形上学的思维框架,以便使公共哲学问题的讨论免除因各种先验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前提预设所造成的不可证明性。但严格的政治哲学限定,实质上把公共哲学的讨论锁定在一种低度理性化的层次,这就是罗尔斯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最大可能性规则”。而系统化普遍理性主义的立场则仍然保持着对公共哲学的某种相对高度的理性化诉求,哈贝马斯对公共交谈所需“理想语言”的语用学探究明显地标示出这一哲学意向。

社会批判理论与严格政治哲学在有关公共哲学的主题范围与理论层次等问题上的差异并不带有根本性意义(哈贝马斯将之称为“家族内部的分歧”),他们对传统社会政治哲学的重构才是根本性的。在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传统首先发轫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国家”理论,随后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亚派之“世界主义”和“普遍理性主义”的“自然法”理论中得到充分的扩展,这一时期所形成并在文艺复兴中期得到发展的“律法主义”政治哲学和法学(从西塞罗、查士丁尼到马基雅维里)是这一理论的经典成果,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近现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或社会政治哲学的理论滥觞。尽管17世纪以降(从霍布斯、洛克到康德、黑格尔,再到功利主义学派)的社会政治哲学在其实质性理论构成上多有突破,如对民主、民权、政体等基本观念的理解;对社会阶层或阶级结构的分辨;对自由、平等和宽容或博爱等基本价值理念的解释等等。但在有关社会政治哲学的主题界限及其哲学论式方面,却呈现出某种不变理路的连贯性特征;即以传统的大一统式的哲学方式来思考公共哲学问题。由于20世纪以前的哲学还不曾卸脱“科学之母”(即“科学的科学”)的皇冠,且对于人类社会事务的所有哲学解释都无法避免